

ZHI
CHINA

知中

了不起的宋版书

特集

校勘精审，刻印精良，
装帧精美，乃成一代之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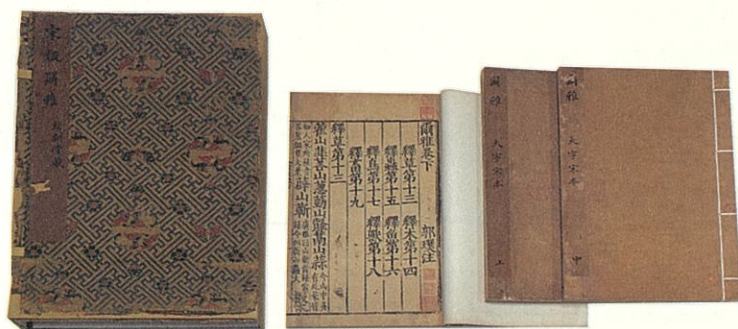


The Golden Age of Woodblock Printing: Block-printed Edition in Song Dynasty

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 宋刻本概述

文：王静 编：元美
text: Wang Jing edit: Yuan Mei

宋代开国时，宋太祖采取重文轻武政策，人才选拔主要是依靠科举取士，极大地刺激了文人读书买书的需求，从中央到地方都开始大力提倡雕版印刷。伴随着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图书信息量明显超越盛唐与五代。两宋 300 余年间，刻书单位之多、雕印地区之广、印刷内容之丰富、印刷作品之精美均为前世所未有，雕版印刷事业迎来了黄金时代。



完备的刻书单位

由于宋代统治阶级强烈的重文轻武意愿，使得刻书、印书、抄书变成了当时普遍的社会行为。雕版印刷在宋代明显具有了不同于其他产业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首先表现在刻书单位众多上，宋代三大刻书系统就可以充分体现这一点。

宋代刻书系统有官刻本、坊刻本、私刻本三种。官刻本是指政府机关刻印的书，有中央和地方之分。宋代不仅国子监刻书，中央朝廷的殿院、司局，地方的州、府、县以及各路使司，各州的军学、县斋、县学等都有刻书。官刻书籍印刷精美、校勘严谨，是宋代刻书水平的典型代表。

坊刻本是由书坊主人主持印制，主要是为了赢利。为了吸引读者，扩大销路，书坊刻本比官刻更具有创新意识。如当时最著名的建安书坊余仁仲的万卷堂，把各家不同注释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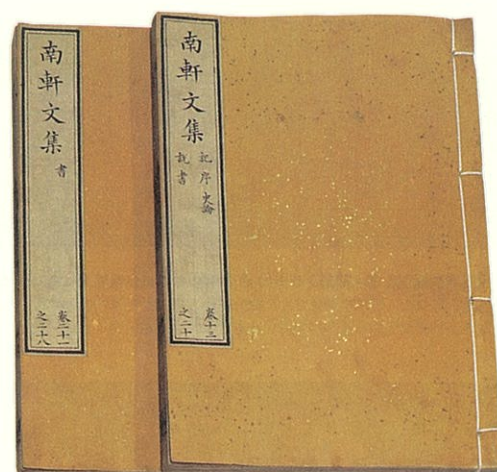
《尔雅》◎晋代◎郭璞注
◎南宋国子监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据南宋理学家魏了翁所言，南宋时国子监所刊印的经注本，是由临安府及附近州郡刊刻，然后将书版送入国子监储存。虽挂名为国子监本，实则出于临安地区。因其书版宽大爽朗，字大清晰，更定为宋刻大字本。此书原为常熟汲古阁毛氏父子旧藏，后为清代毕沅经训堂所得。

编在一起，刻印了《礼记》，而且每卷末均标出经、注、传、音、义若干字，这就使得这部《礼记》具有了类似于工具书的查阅比较作用，十分方便学习，引得大家争相购买。当时的书坊就已有广告意识，会随书附带刻刊记。余仁仲为其新刻的《春秋公羊传解诂》所作后记，即是书坊的广告，说明刻书者对本书负责，并做了一些搜集和校勘工作。这种形式为书坊争取了很大的商业信誉。此外在刊刻时，书坊还会附带相关插图，这些手段不断地刺激着民众的需求，使坊刻成为宋代流行的刻书方式。

私刻本的主要目的不是赢利，往往是由学者或藏书家主持刊刻，为了流传善作，保存自己或亲友的著作。私刻本虽然印刷量不如官刻和坊刻，但是校勘认真，雕刻讲究，用纸优良。整个北宋私宅家塾刻书成风，到南宋更是盛极一时。



《南軒先生文集》◎宋代◎张栻撰◎宋淳熙、庆元年间严州刊本



丰富的印刷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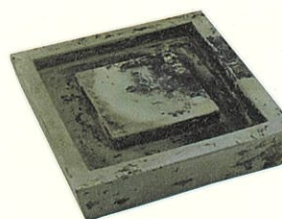
宋代虽然外患内忧不断，但终宋之世，中央朝廷一直大规模雕印儒家经典，使得经学类书籍在宋刻书中占有很大比重。咸平年间，宋真宗曾诏令国子祭酒邢昺等人主持校订刊印《九经义疏》，颁行天下作为法定教材。¹咸平四年（1001年），宋真宗下诏，除州县官学之外，同样给聚徒讲习的地方颁发《九经》，后又允许监本《九经》定价出售。景德二年（1005年），《九经》的书版增加了数十倍，而且经、传、正义齐备。

不仅最高统治者重视经学著作的刊印，官员在公务之余，往往也会同属吏一起校对刻书。王安石变法时，设立经义局，为《诗》《书》《周礼》三经作“新义”。熙宁八年（1075年），《三经新义》付临安开版摹印，并作为科举取士的定本颁行全国，成为变法的依据。有的士人为了更好地宣传自己的经学学说，甚至直接刊印自己的经学著作。其中最有名的是朱熹，他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支持其理学思想的经典系统，对这四部书做了简要而且精密的注释和阐发，并于绍熙元年（1190年）在漳州地方官任上付印，至此始有“四书”之名。

据《宋史·艺文志》记载，经部著作（包括乐类、小学类著作）总计 1304 部，13608 卷，远远超过了《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经部著作数量。即使历经各代的流失散佚，宋人说经、解经之书收入清朝《四库全书》的仍约有 185 部，至今有宋本留传者尚有四五十种。



银鎏金踏莎行人物故事盘盖 ◎南宋 ◎一组二件 ◎邵武市故县村窖藏出土 ◎福建省邵武市博物馆 藏
金银酒器不管在大型宴会还是日常对饮中都是宋人喜爱的器物。这组杯盘，杯内底部刻有“踏莎行”词曲，提到了士人高中状元时欢欣的景象，反映出宋代士人通过科举取士踏入官场的热切期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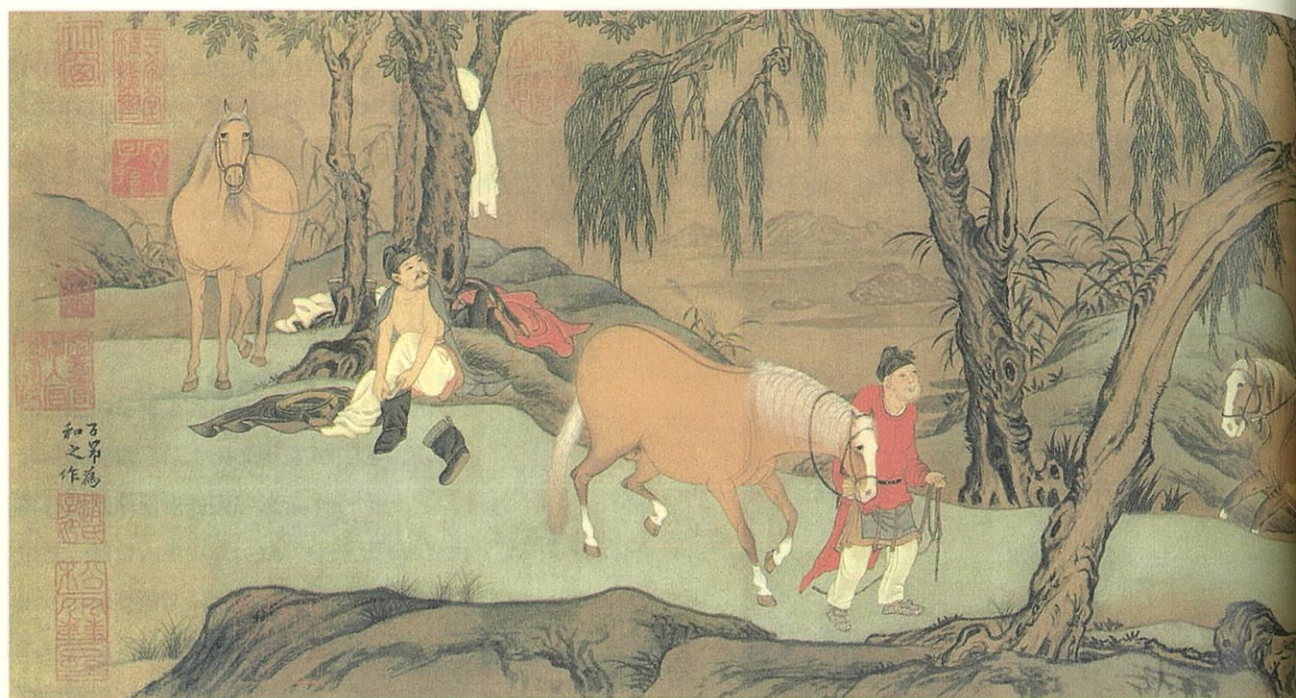


“仲举澄泥”铭砚 ◎北宋 ◎砚面 17cmx16.8cm，底 16cmx15.6cm ◎扬州博物馆 藏
1998 年于扬州市郊城北三星村宋墓出土。砚澄泥质，极细腻。近正方倒梯形，砚面残留墨迹，边沿回形砚池。底微内凹，中铃“仲举澄泥”方形阴文印，是宋代澄泥砚的精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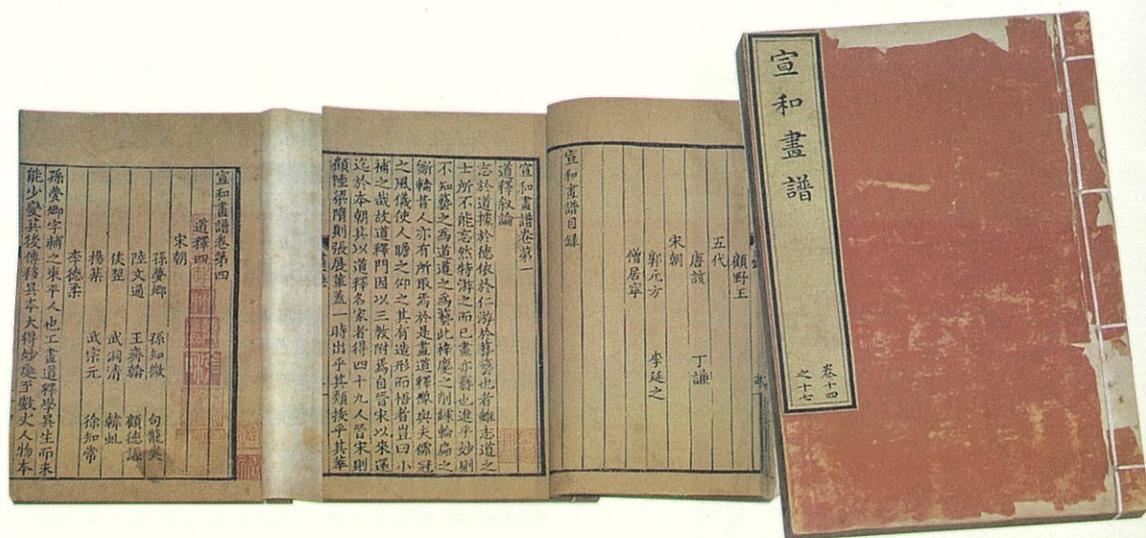


青玉龟游荷叶洗 ◎南宋
读书人在案头常备的除了笔墨纸砚之外还有笔洗，笔洗可以盛水，是文人用来润湿或者洗涤毛笔的，平常放置在砚旁。宋代文风鼎盛，笔洗是当时流行的文房用具。

¹ 邢昺有云：“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臣少从师业儒时，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盖不能传写。今版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



《浴马图》◎元代◎赵孟頫◎绢本设色◎28.5cm×154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宣和画谱》◎元代◎吴文贵杭州刊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书成于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作者已不可考。这是一部记载宋徽宗时期内府藏画的谱录，是我国藏画专书的创始。全书收录自晋至宋231位画家的6396轴画作，还曾录及日本的画作。元大德六年（1302年）吴氏杭州刊本是此书第二次刊印。

后来姚枢因不满蒙古贵族徇私枉法的风气而弃官，“遂携家来辉，垦荒苏门”⁵，在北京自版《小学》《论孟或问》《家礼》等书，姚枢的刻书行为是现北京地区现今已知的最早刻书记录。

除此之外，姚枢还让他的弟子杨古根据《梦溪笔谈》中记载的毕昇泥活字摆印法进行刻印，杨古是历史上据此方法进行实践并且获得成功的第一人。虽然那时元代还没有正式确立政权，但当时北方地区已经受蒙古管辖，所以可将姚枢和杨古的刻书实践视为元代刻印技术的飞跃和元代私刻的开端。⁶流传至今的最早的元代私宅刻书，是平阳道参幕段子成刻印的《史记集解索隐》130卷，现藏于北京图书馆。

中央刻印机构完备

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政权后，承袭了宋、金以来的国家体制，并根据民族和时代需要，在其基础上进行了变革和发展。早在至元初年，忽必烈就在大都设置了国

子监；至元十四年（1277年）设立蒙古国子监，立蒙古国子学；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又在大都设立国子学，完善了中央高等教育体系。

但元代管理刻书的官署却不是传统的国子监，而是中书省，刻书的任务也不由中央发出。而是由出版机构向中书省进行申报，得到批准后可以刻印和发行。但是这个状况并不绝对，根据不同书的不同状况，有时要向不同的官署进行申报，等待批准。⁷

现在可知的元代中央刻书官署有秘书监的兴文署、艺文监的广成局、太史院的印历局和太医院的广惠局（医学提举司）。

兴文署是中央直属的刻印机构，隶属于秘书监，而非国子监。后期隶属于国子监时已不具有刻书职能。“至元十一年十一月初七日，太保大司农奏过事内一件，兴文署掌雕印文书，交属秘书监。”⁸至元十三年（1276年）兴文署被并入翰林院，由王待制监管刻印，但是大小事务仍然由秘书监管理，并且由秘书监主管雕印工匠。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朝廷复立兴文署，设置官员，并

5 出自元代姚枢《牧庵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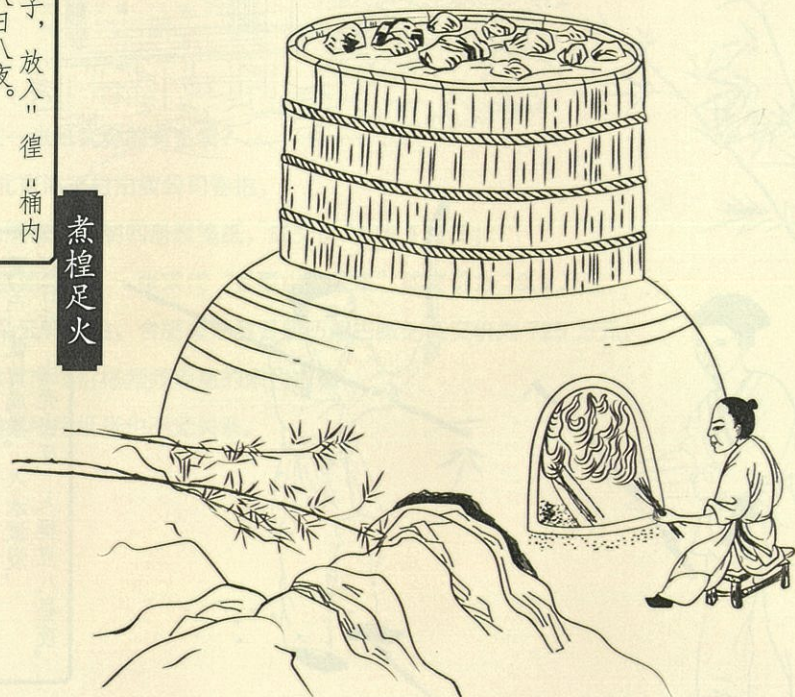
6 王益主编，历代刻书概况[M]，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1。

7 同6。

8 出自元王士点、商企翁撰《秘书监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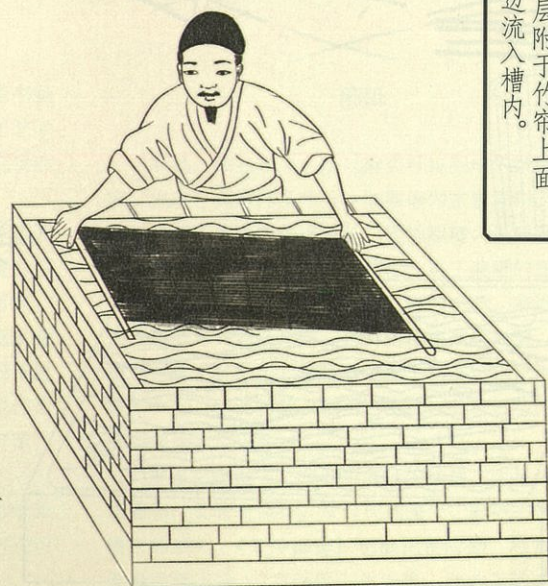
将以上所得之竹子，放入“徨”桶内与石灰一道蒸煮八日八夜。

煮徨足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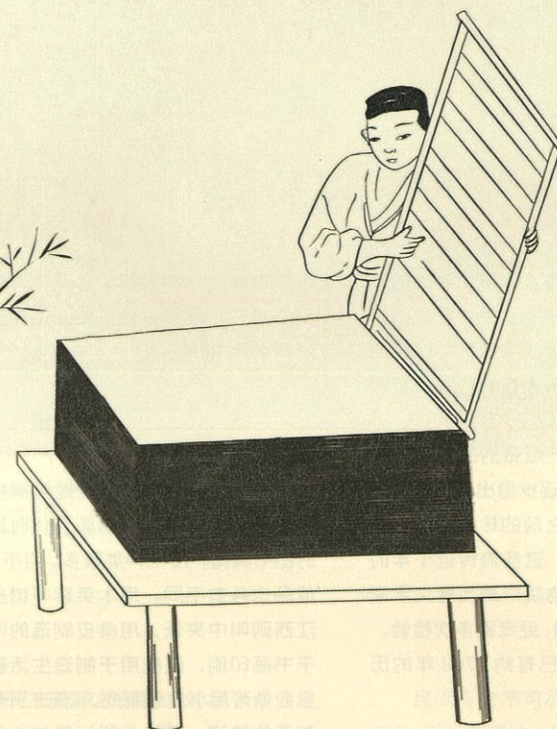
荡料入帘

将被打烂之竹料倒入水槽内，并以竹帘在水中荡料，竹料成为薄层附于竹帘上面，其余之水则由竹帘之四边流入槽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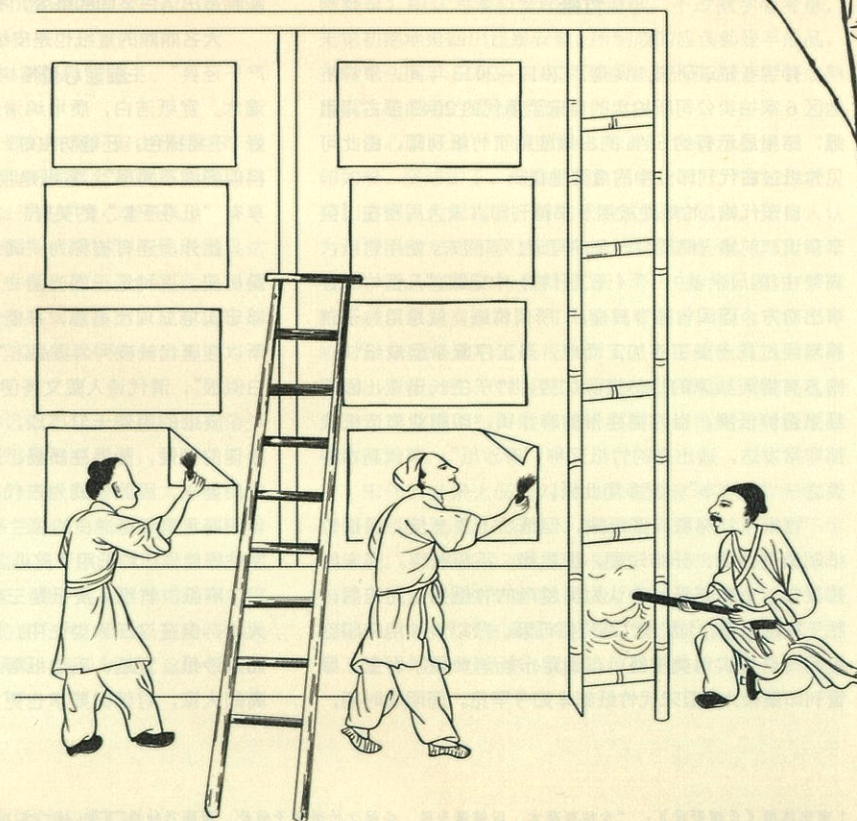
覆帘压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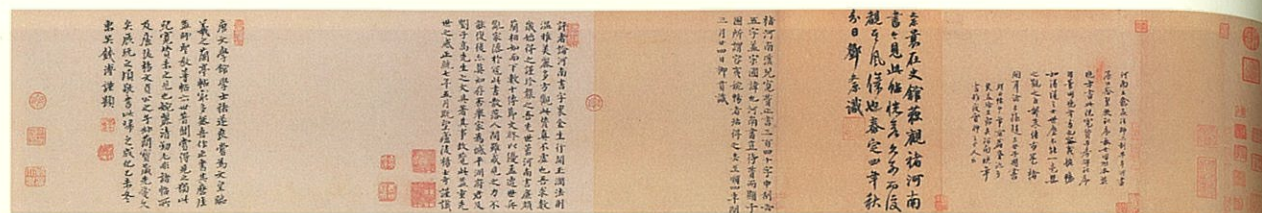
然后将帘反复过去，使湿纸落于板上，即成张纸。如此，重复荡料与覆帘步骤，使一张张的湿纸叠积上千张，然后上头加木板重压挤去大部分的水。



透火焙干

将湿纸逐张扬起，并加以焙干。焙纸的设备是以土砖砌成夹巷，巷中生火，土砖温度上升之后，湿纸逐张贴上焙干。干燥后，揭起即得成纸。





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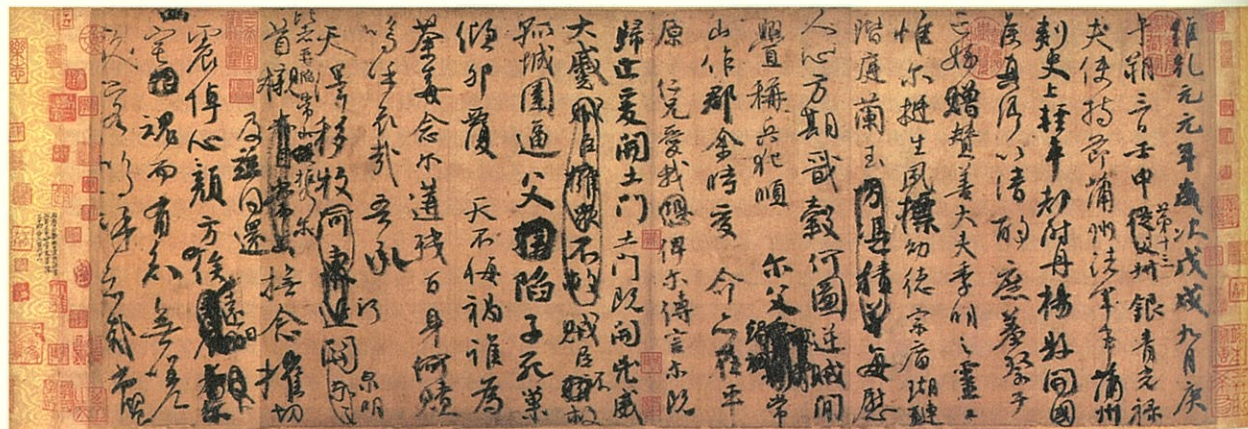
The Beautiful Calligraphic Fonts from the Song Edition Books

宋版书字体之美

文：丁斯瑜 编：元美
text: Ding Siyu edit: Yuan Mei

宋版书在书籍界的价值被视作重于黄金，究其原因，在于宋版书集合了宋人的审美，我们可以从宋版书窥见宋人的生活状态，甚至是他们的美学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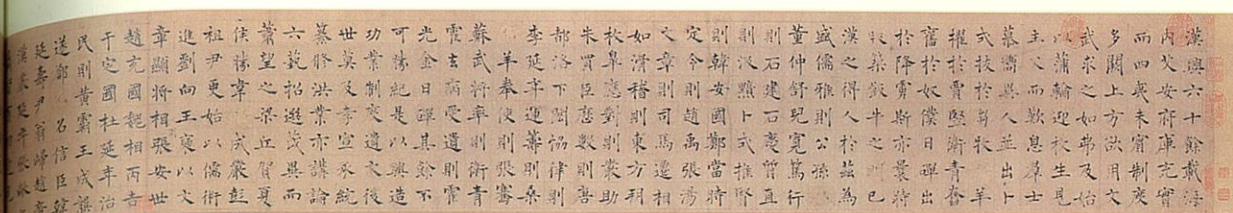
在宋版书之前，我国雕版印刷的书籍还比较罕见，雕版印刷在宋代以前还只为皇家或宗教寺庙服务，以印刷佛经和诸子正史为主。到了宋代，印刷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政府对文化的鼓励与支持，使得宋代书籍的内容格外广泛，儒学、史学、医学、文学、宗教……宋代的自由之风，使得文化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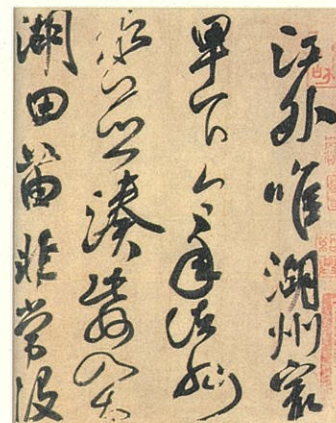
《祭侄文稿》◎颜真卿◎行书◎28.2cmx72.3cm

《祭侄文稿》，全名《祭侄赠赞善大夫季明文》，又称《祭侄帖》。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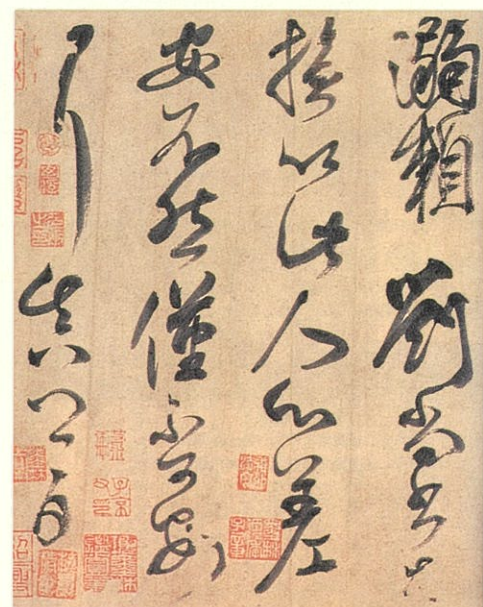
这篇文稿计25行，230字。追叙了常山太守颜杲卿父子一门在安禄山叛乱时挺身而出，抵抗叛军，以致“父陷子死，巢倾卵覆”的取义成仁之事。颜真卿援笔作文之际，悲愤交加，情不自禁，一气呵成此稿。后世点评此书法有三大特色：圆转遒劲的篆籀笔法，渴涩生动的墨法和开张自然的结体章法。



《倪宽赞》◎褚遂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湖州帖》（局部）◎颜真卿



宋代雕版印刷具体来讲，是要书法家先按印刷规格将要印的字写在薄纸上，然后反贴在枣木或梨木上，其后用刀将反字刻在木板上，印刷时给木板上的阳文覆上墨水，便可以直接印在纸上。

宋代是一个书法全盛的时期，宋徽宗本人更是精通书法，甚至独创了属于自己的瘦金体。宋代的印书人也追求字体的完美，宋人偏重稳重庄严的楷体，因此当时已经很有影响的几位唐代书法家便广受推崇，欧阳询、柳公权、褚遂良、颜真卿的书体得到广泛使用。而各地因为推崇的书法家不同，所使用的书体风格也不尽相同。通常来说，浙江刻本多用欧体，字整体偏瘦，笔力险劲，意态俊逸；福建刻本多用柳体，字体方正，骨力遒劲，结体严谨；四川刻本多崇尚颜体，用笔肥厚粗拙，金健洒脱；江西地区的刻本则兼而有之，吸收了各地的不同特点。

宋人崇尚唐代书家是有原因的，唐代是书法艺术的发展高峰，而宋代延续了这一风气。唐代书法艺术继承了六朝时期的气韵，尤以楷书为重，将南朝楷书的秀美与北朝魏碑的方正化为一体，形成了独有的盛唐气势。对初唐时期书法风格影响较大的是欧阳询，他由陈入唐，在贞观初期，唐太宗爱惜他的书法，命他为皇帝的行宫“九成宫”写碑铭，这就

是后来著名的楷书范本《九成宫醴泉碑》。不得不说，唐代的书法艺术能够达到如此高度，和唐太宗的推重不无关系，以至唐代的国学有六类，第五便是“书学”，举国提倡书法，人人效仿。欧阳询书法最大的特点便是结构严谨，笔法以险劲见长，《唐书》中记载他“初效王羲之，后险劲过之，因各名其体”，笔力极强，结构稳重，使得书法整体穆然高简。

宋版书中更常见的是颜体和柳体。颜真卿是继王羲之后又一位书法大家，他的高祖是北齐著名学者颜之推，著名的《颜氏家训》便出自他手，曾祖是初唐学者颜师古。安史之乱中，颜真卿的侄子惨死于安禄山叛军的刀下，他悲愤地写下《祭侄文稿》，成为书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篇佳作。颜真卿书法先学褚遂良，后得张旭亲授。他的楷书以拙为巧，气势如虹，笔画雄厚，从褚遂良的笔法入手，而笔意则直追王羲之。苏轼曾作诗赞其曰：“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后人所谓“颜筋”便是此意，虽笔法粗拙，而内有筋骨，雄劲道健。

继颜真卿之后，中晚唐时期的柳公权又是另一位书法大家。柳公权早年也研习王羲之，后专学欧阳询、颜真卿，将几人特点结合而自成一派。宋代米芾评论柳公权“如深山道士修养已成，神气清健，无一点尘俗”。柳公权流传下来的

The Format of the Song Edition Books

宋刻本版式全解

文: 迟广赞 编: 元美
text: Chi Guangyan edit: Yuan Mei

明代戏曲作家高濂

在《遵生八笺》中曾赞宋代刻本“开卷一种书香”。这股“书卷气”不仅在于“纸坚刻软，字画如写”上，更表现在宋刻本的版式设计上。

宋刻本版式集实用与审美于一身，对后世的出版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鱼尾

中国古籍的传统印版，在刻版时，大多是合两页为一版，两页之间设有一定宽度的版心分隔。用这种刻版印刷出的书页在进行装订之前，有一道先将书页从版心处对折的工序。为了使对折准确，会特地在折缝处设计出一种状如鱼尾的记号，作为折叠书页的标准。以数量区分，有单鱼尾、双鱼尾、三鱼尾；以方向区分，有逆鱼尾（两个鱼尾形标记方向相反，也称“对鱼尾”）和顺鱼尾（两个鱼尾形标记方向相同）；以图案区分，有白鱼尾（鱼尾只有外部轮廓）、黑鱼尾（鱼尾轮廓内用墨填充）、线鱼尾（鱼尾由线条构成）、花鱼尾（鱼尾下部为曲线形如花瓣状）等。

版面

单张书页的印刷面

书耳

又称“耳格”或“耳子”。指刻在版框左栏外上角的一个小长方格。书耳内多刻有本书的篇名（小题），称作“耳题”，便于篇目检索。

象鼻（黑口）

版心上下边栏至上下鱼尾间的两个部分。印黑称作“黑口”，反之则为“白口”。宋版书多白口或小黑口（细黑线），元版书多大黑口（粗黑线）。还有的在象鼻处刻有文字，称为“花口”。

栏线

天头

书页版面上方没有印刷图文的部分。

界格（界行）

指版框内字行之间的分界线，又称“行线”或“行栏”，在唐代叫作“边准”，在宋代则被称作“解行”。刻印本的界行是从古写本演变而来。后世抄写的书籍，边栏和界行使用不同颜色作为区分，常见的如乌丝栏（墨格）、朱丝栏（红格）、蓝格、绿格等。

版框

单边

对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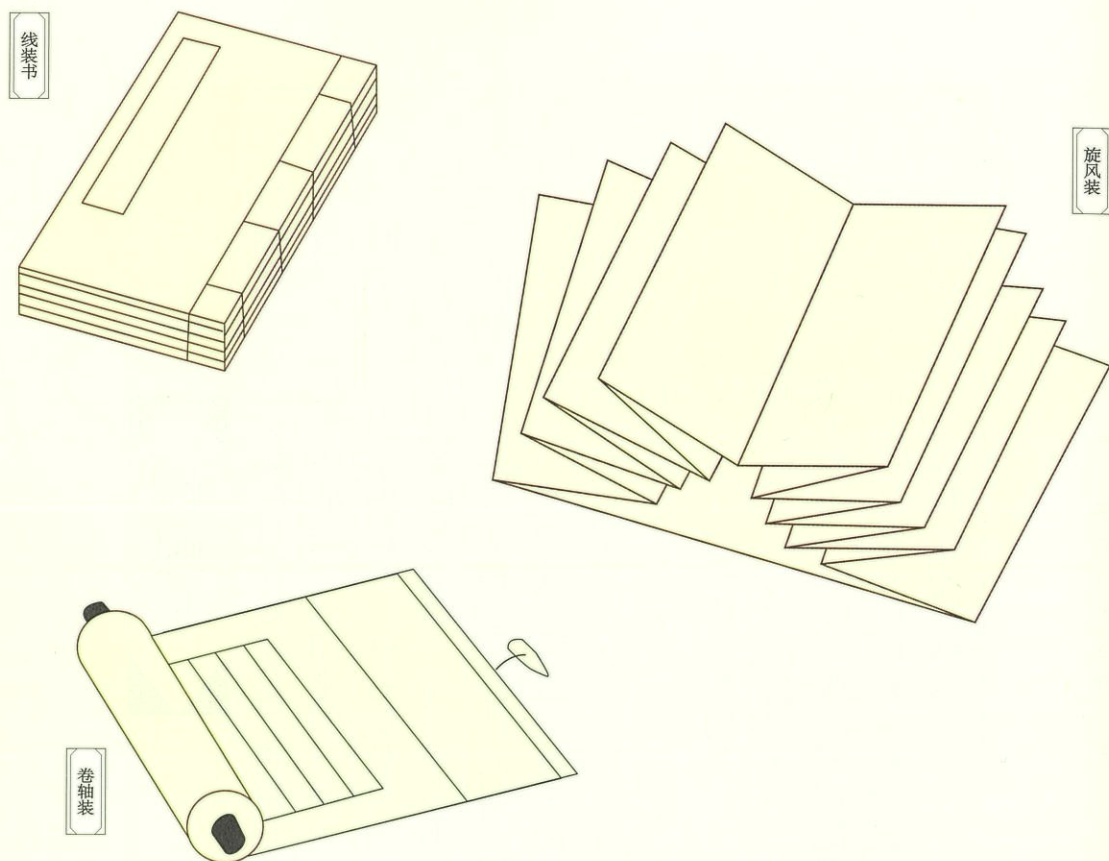
又称“边栏”，指围成版面四周的直线。主要分单边（书版四周都用一道直线围成，多为粗实线）和双边（书版四周用两道直线围成，分“左右双边”和“四周双边”两种形式。多为“外粗里细”的两根实线，又被称为“文武边栏”）两种形式。此外，还有少数以图案构成的边栏，称作花边。

版心

也称“中缝”，指的是包背装和线装书的书口，即每张书页的正中折缝处。某些版本会在此处刻上书名、卷次、页次、字数和刻工姓名。

地脚

书页版面下方没有印刷图文的部分。



书脊的厚度，双痕对折，作为封皮，用糨糊粘包书脊，最后裁齐天头地脚及封面的左边，一册包背装的书籍就装帧完毕了。这种装帧方式的特点在于包裹书背，所以被称为包背装。

包背装大约出现在南宋中晚期，历经元明，一直到清末，风行数百年。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官刻本，几乎都采用包背装。其实古籍的包背装很像现代的书。所不同的是，古籍包背装的书页是单面印刷，合页装订；现代书籍是双面印刷，折配装订。包背装是在书脊内侧竖订纸捻以固定书页，现代书籍则是在书脊上横向锁线以固定书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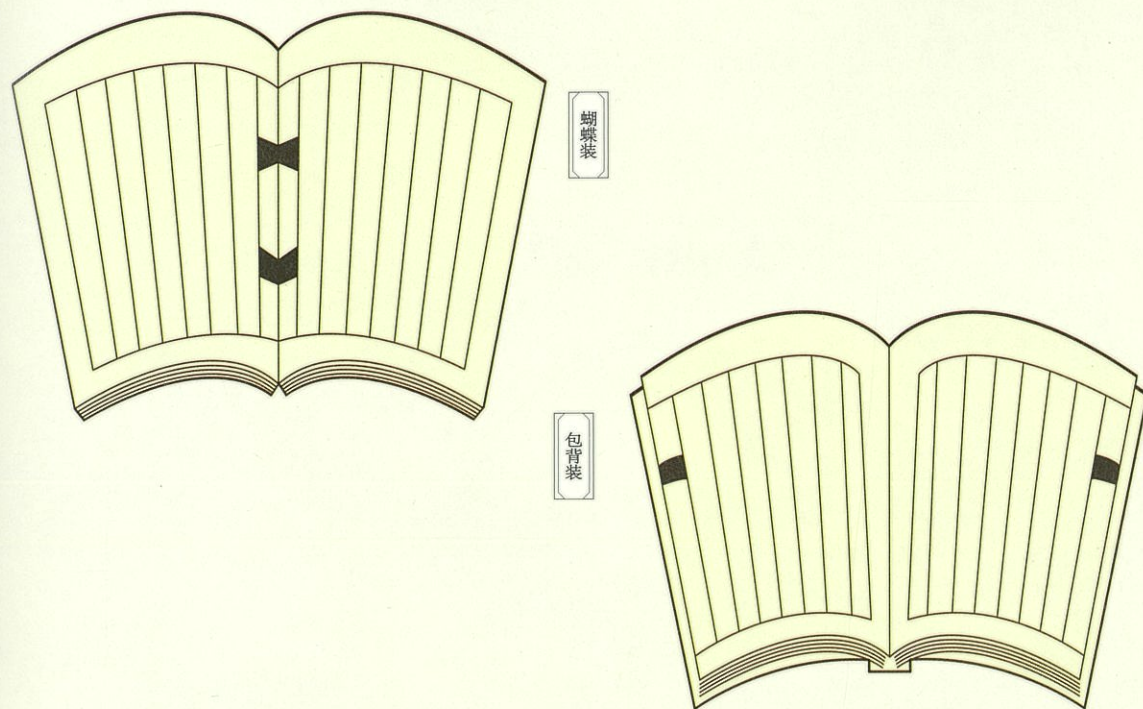
包背装虽然解决了蝴蝶装开卷便是无字反面及装订不牢固的弊病，但因这种装帧仍以纸捻装订、包裹书背，若是反复翻阅，仍然会导致书页散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种新的装帧方式悄然出现，并于明代逐渐兴盛起来，这就是今人耳熟能详的“线装”。

线装与包背装在折页方面没有任何区别，只是装订时不用纸捻固定书页，也不用整纸包裹书背而作封面。而是将封皮纸裁成与书页大小相一致的两张，前一张后一张，与书

页同时戳齐，再将天头地脚及右边剪齐，用重物压稳固定，最后打眼穿线装订。线装是中国古籍装帧技术的集大成者，是最先进的。线装书既便于翻阅又不容易破散，既有美观庄重的外形又坚固耐用，所以直到今天，在影印古籍的时候，我们还常常采用这种装帧方式。

然而在中国古籍装帧发展史中，线装自明代开始盛行，并不是因为明代之前不具备线装装帧的技术条件。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的中国敦煌遗书中，有几件是唐五代时期的遗籍，也有少数北宋初年的古籍。这些古籍有的是在书脊上端用线横锁书背；有的在书脊内侧上下端各打一透眼，然后用线绳横锁书背，再连穿下端透眼横锁书背，最后系扣打结；有的在书脊内侧上、中、下打三个透眼，然后逐一横锁书脊，竖向连穿，最后在中间打结系扣。这些都是线装装帧的雏形，所以可以判定的是，在唐末五代时期，我国就已经出现了线装装帧技术，并称之为“缝绩装”。

这样纵向看来，线装装帧在宋代出现了一个特别的“断档期”。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宋人认为，古籍装帧最好用粘页的方法，日久糨糊失效以后即使散开，只要书页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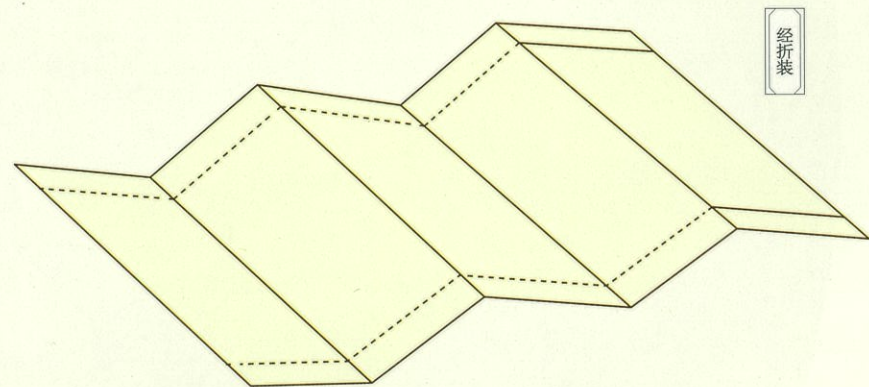


好，还能找到书页的次序予以恢复。而如果采用缝绩的方法，时间一长，缝的线一断，就很难找到书页原来的次序了，这是缝绩装的弊病。²除此之外，缝绩装书籍制作前需要排版，而这项技术比较复杂，用纸量也要比一版一印书籍大，且印刷时有一定的难度。因而用缝绩装帧做书，生产速度较慢，生产成本很高。再加上缝绩装书籍的书页要两面书写，对用纸厚度有一定要求。否则，若书页很薄，书页两面的字迹就会互相渗透，且缝绩时书页容易被线勒断。而在宋代，为了降低制作成本，书籍用纸变得越来越薄。这使得纸张的抗拉、耐折及遮光能力下降了，不能满足缝绩装两面书写的需要。因此，在传统的一版一印的手工印刷方式占主导地位的宋代，作为线装雏形的缝绩装没有流行

起来，而装帧形制更加古典风雅的蝴蝶装和包背装占据了印刷界的统治地位。

到了明中页以后，社会文化迅速发展，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市民阶层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古籍的流通翻阅也更加频繁。装帧不牢固、不便利的蝴蝶装与容易散裂的包背装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所以线装装帧才在经过改良后重新盛行起来。

处于古籍发展史上启下地位的宋版书，因其精致的刻印工艺而独具价值。蝴蝶装和包背装的装帧方式赋予宋版书极其典雅的美感，而线装装帧在宋代步入“断档期”的史实也从侧面说明，宋代社会从文化到工艺，都散发着一一种阳春白雪的气质。



² 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云：“作书册粘叶为上，久脱烂，苟不逸去，寻其次第，足可抄录。屡得逸书，以此获全。若缝绩岁久断绝，即难次序。初得董氏《紫露》数册，错乱颠倒，伏读岁余，寻绎级次，方稍完复，乃缝绩之弊也。”

The Introduction to Textual Criticism of Song Dynasty

校书如拂几上尘：宋代校勘学简述

文：常上永 编：元美
text: Chang Shangyong edit: Yuan Mei

宋代是雕版印刷走向成熟的时代，读书、藏书、校书的条件都已完备，在累年的阅读中，宋人逐渐形成了较为务实的学风，这些因素都共同促进了宋代校勘学的发展，校勘学理论也在此时初步成熟。宋人的校勘学实践极大地影响了我们今日所见典籍的文本形态，如苏轼校“悠然望南山”为“悠然见南山”，曾纮校“形天无千岁”为“刑天舞干戚”，他们对原诗的改动并无版本依据，全凭理校，却依然得到后世的认可，推为高论并成为定本。但是，关于这两处改动的正误依然颇多争议。一方面，我们可以窥见宋人读书之极精极博；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后世所见的典籍大多曾经他们之手，处于书籍由写本时代走向刻本时代的转型期的宋人，在稳定文本形态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青衫叙进校书郎：宋代的馆阁校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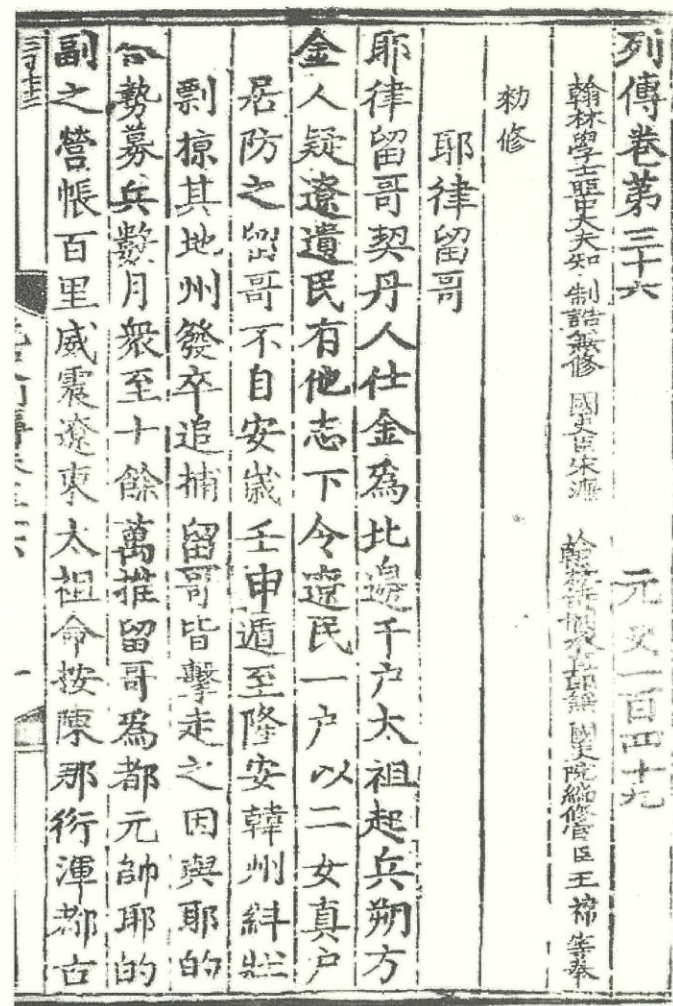
“小富秋来慰所望，青衫叙进校书郎。相公勋业久弥著，孙子门阑渐有光。”这是宋代诗人晁说之祝贺友人担任校书郎所作贺诗中的诗句，诗中的“小富”为北宋名相富弼之孙富直柔。校书郎和正字自唐代以来就属清选之官，其职务虽为校勘秘书典籍，却有着极好的迁转前景。在重文轻武的国策下，宋代朝廷确立了各种制度以优待文臣，尤其是以清要著称的馆阁，名义上的工作是校勘、整理图书，却兼有储备人才以备天子之选的职能，这对读书人来说无疑是极大的诱惑。

馆阁指的是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和秘阁，宋代开国之初崇尚文治，在馆阁中汇集了众多文士，修订了许多大书。宋人对此有种说法：“太平兴国中，诸降王死，其旧臣或宣怨言。太宗尽收用之，置之馆阁，使修群书，如《册

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之类。广其卷帙，厚其廩禄，以役其心，多卒老于文字之间。”（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一）尽管学者对此说不甚采信，但从中可以窥见宋初重文之风盛行，宋太宗以敕修群书的方式点缀升平，以安文士之心。馆阁中的文士得以接近宫中秘藏的图籍，也由此触发了宋代校勘学的繁荣。此外，国子监主要负责儒家经典的校勘刻印，不比馆阁之遍校群书。

宋代官府刻书继承了五代以来国子监重视校勘的优良传统，多委派学有所长的名儒担任校勘官，除却选择具有专业知识的官员上版外，还有多名校勘官、复校勘官参与其事，有复校、点检、复点检等多道程序，以求无误。宋代馆阁曾多次大规模校书，每次校勘都会对秘阁图书进行全面整理和编目。

早在宋太宗时期，朝廷就建崇文院以储图籍，真宗时



《元史》明洪武三年内府刻本

编《咸平馆阁书目》，又命刘均等官员屡次校理图书，分类贮藏。不久崇文院大火，朝廷又增募官员补辑被毁的部分。仁宗朝时王尧臣上《崇文总目》66卷，正其讹误，去其重复，录书3万余卷，基本反映了北宋前期的藏书情况。《崇文总目》编成之后，宋仁宗又命蔡抗、苏颂、欧阳修等人编校图书，并广开献书之路，在《崇文总目》之外又校订图书8000余卷。

宋徽宗时以“丰亨豫大”为标榜，为宣扬太平局面再次展开校书活动，新编《秘书总目》，著录6000余种书籍，共7万余卷，标志着宋代宫廷藏书达到鼎盛。不久靖康之变发生，徽钦二帝、王公贵族连同他们多年来秘藏的珍宝被金人一并掳去，学者们精心校订的秘阁图书也大多被毁，百不存一。宋高宗南渡后在秘书省复置补写所，又广求州县之书，至孝宗时编成《中兴馆阁书目》，著录藏书4万余卷，虽较此前已少去一半，但已能追及北宋前期的盛况。宋宁宗时又编

有《中兴馆阁续书目》，增藏书1万多卷，倒也足以作为中兴治世的点缀。

除了为整理宫廷藏书而进行校勘缮写，宋代馆阁更重要的校勘实践则属为颁行某书而组织的专书校订。这一系列活动以馆阁文臣为主体，借助丰富的藏书资料，对历代正史、诸子书籍、医药著作均有涉及。这些版本在当时一经勘定，便由朝廷颁行天下，质量较高且具权威性，作为典籍底本一直为后世采用。《中兴馆阁录》中就保存了一份当时校勘官的工作细则，对校改、断句、标音的格式和使用符号均有详细的说明，所有校勘官在校勘完后均要署名，然后才能上报。

宋代官府的专书校勘主要集中于北宋前期，当时对四部典籍和史部均有全面关注与整理。早在太宗初年，文字学家徐铉就奉诏与句中正等人校订《说文解字》，不仅清除了唐代李阳冰的妄改与妄增之处，还改易分卷，增加了注释与反切，

The Four Largest Library of Qing Dynasty

晚清四大藏书楼

文：桂静繁 绘：姜林 编：元美
text: Gui Jingfan illustration: Jiang Lin edit: Yuan Mei

泱泱华夏五千年历史，藏书的传统可以追溯至周朝。

《史记》中有这么一段关于老子的记载：“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据证，“守藏室”便是周朝藏书之所，

也就是说老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考的图书馆馆长。

秦始皇焚书之后，自西汉始，皇室开始大量收藏书籍。

汉相萧何在未央宫旁设“石渠”“天禄”两阁藏书，

《汉宫殿疏》云：“天禄、麒麟阁，萧何造。以藏秘书，处贤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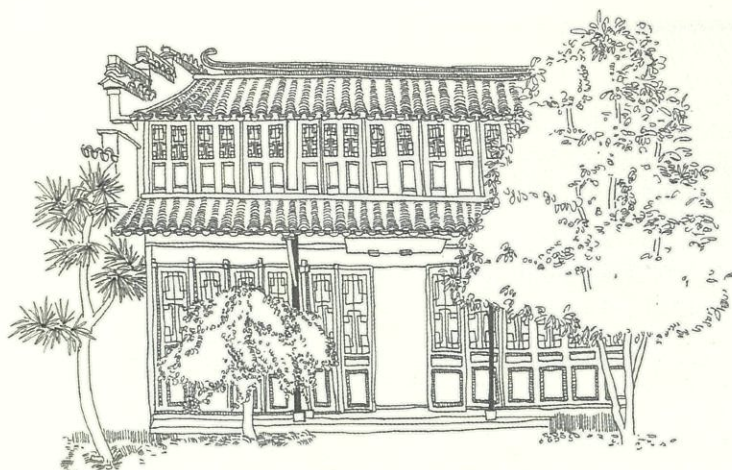
时至唐代，随着书籍出版业的扩张，民间藏书开始快速发展。韩愈在《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一诗中写道：“邨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足见唐代私人藏书之盛。而宋代雕版印刷术的发展则促使书籍刊印业迅速壮大，大量发行的刻本使私家藏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清代，私家藏书在民间蔚然成风，进入了鼎盛的状况。

私家藏书与官方藏书自唐以来便是我国书籍流通史上并列发展又相互交融的两条线。官方藏书在改朝换代的大战乱中会散佚于民间，而到了太平盛世官方又会要求民间献书。

私家藏书与官方藏书有着诸多不同。从目的上来讲，私家藏书可分为保守派与开放派。开放派“藏而致用”，以开放的态度欢迎天下读书人来读书交流；保守派“秘而不宣”，所藏书籍仅在特定情况下供自家人阅读学习。但是到了清代，保守派的思想逐渐转变，世家藏书也开始公诸世人，广为流布。这与代代“养在深闺人未识”，仅供

皇室赏玩的皇家藏书大不相同。从内容上来说，官方藏书多为正统经史或是经国治世的学问，而私家藏书则多以藏家的喜好为准，戏曲杂剧、民间闲话等书籍比比皆是。两个藏书系统的内容形成了一种互补，使得我国古代书籍种类的流传更为多样丰富，缺一不可。

清代是私家藏书的顶峰，有文献记载的藏书家多达2082人。收藏家们多建楼阁以藏书，晚清时，更是有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聊城杨氏海源阁、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归安陆氏皕宋楼并称为“晚清四大藏书楼”。四大藏书楼鼎盛一时，声威隆重，天下读书人无不景仰而欲登临。只是时值晚清，四大藏书楼亦不能幸免于乱世，遭遇各不相同：皕宋楼失于日本；海源阁散佚民间；八千卷楼得张之洞等高官力保，归于江南图书馆；铁琴铜剑楼得益于瞿氏后人力保，多次辗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依然保存完整，终归于北京图书馆。四大藏书楼藏盛世之书，建于乱世之秋，其间命运造化，每个拿出来，都是一个故事。



铁琴铜剑楼

铁琴铜剑楼位于江苏常熟古里镇西街，为乾隆年间瞿绍基所建。瞿家世居古里，有良田千顷。瞿绍基“读书乐道，广购四部，旁搜金石。历十年，积书十万余卷”，建“恬裕斋”以藏书。瞿绍基独子瞿镛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也致力于藏书，而后因为得到一张铁琴，一把铜剑，遂将藏书楼改名为“铁琴铜剑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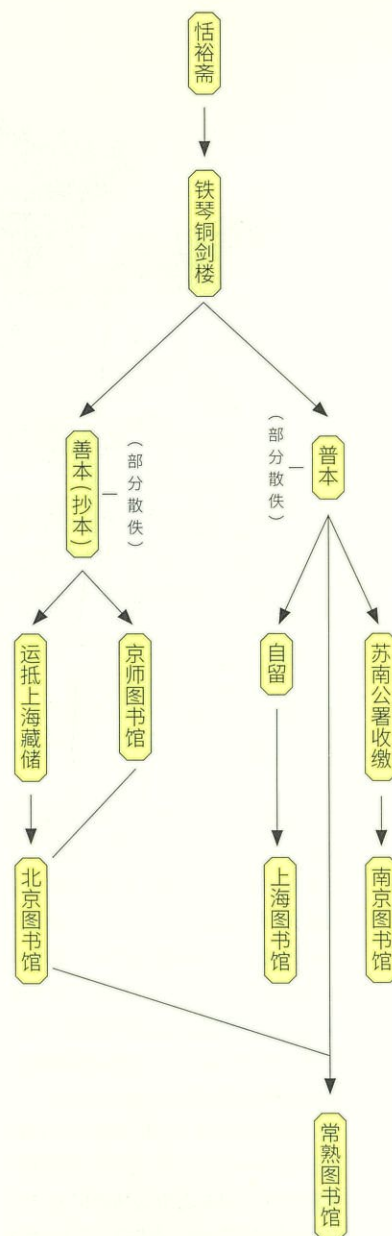
铁琴铜剑楼中藏书，主要是由瞿绍基、瞿镛两代楼主苦心经营所得，一部分来自瞿氏家族遗书，一部分来自瞿绍基抄录的图书，其余则是从外购入。铁琴铜剑楼成于乾隆年间，彼时民间收藏之风日盛，典籍广泛流传，瞿家颇有底，得以将一些流传善本收入家中，如瞿绍基便收购了稽瑞楼、爱日精庐两家的藏书善本。而真正让铁琴铜剑楼名声大振的是在咸丰年间，第二代楼主瞿镛收入了很多长洲汪氏艺芸书舍散出的宋元精槧，这批藏书流传有绪，皆为精品，大大提高了铁琴铜剑楼的藏书质量。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铁琴铜剑楼第四代楼主瞿启甲刻印藏书目录——《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记录铁琴铜剑楼所藏善本共1228种。其中便

有极其珍贵的宋刻本160种，金刻本4种，元刻本106种，其余藏书也均为稀见的明刊刻本、旧抄及校本。而在这1228种藏书中，有经部165种，史部246种，子部43种，集部474种。由此可见，铁琴铜剑楼藏书依旧以传统的经、史、子、集四大类为主。

铁琴铜剑楼的这一批善本藏书，在清末四大藏书楼中散佚并不算严重，这都得益于瞿家五代家主的尽心经营与维护。自瞿绍基与瞿镛后，铁琴铜剑楼藏书传至瞿家第三代时，正值太平天国战乱，江浙大量藏书楼毁于战火，而瞿镛之子瞿秉渊、瞿秉清毅然冒着战火，带着藏书往江北避难。现代学者陈登原对此评论：“铁琴铜剑之藏，则以瞿镛有贤子孙，扶书避难，虽稍受损失，而珍秘之本，维护未坠。”

瞿家第四代瞿启甲则是护着铁琴铜剑楼躲过了民初乱世的战火。《常熟市志》中记载，1909年时，两江总督端方命瞿氏献书，并承诺以京城官职换之，瞿启甲不为所动，后来在瞿家族老的劝说下才献上一些旧志与影抄。后来军阀混战，瞿启甲将所藏全部珍本带往上海，使得这些珍本躲过了日军的战火，瞿启甲去世前曾留下



遗命：“书勿分散，不能守则归置于公。”

于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瞿家第五代便将铁琴铜剑楼藏书半捐半卖，多数归于北京图书馆。剩余的，一部分书籍被苏南公署收缴，归入南京图书馆；还有一部分书籍为瞿启甲幼子瞿凤起随身之书，后捐献给了上海图书馆。因此铁琴铜剑楼藏书最终虽分散各处，但来源清晰，去向明了，传承未断。



梁启超 (1873—1929)

被公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也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杰出人物。爱藏书的梁启超在目录学方面贡献尤巨，1896年成书的《西学书目表》，录西学书籍400种，西政书籍168种，为近代西方图书分类法的引入和我国新图书分类法的诞生开辟了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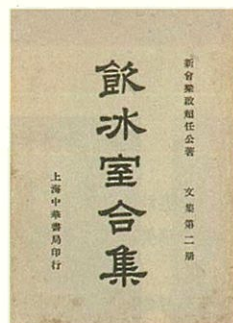
1949年3月22日，郑振铎出席第一届全国文代会筹备会并发言。



吴梅



郑振铎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1936年9月11日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共40册，以编年排列，分为文集、专集两部分，近千万字。



《奢摩他室曲丛》，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出版。

张元济晚年所写的一副对联。嗜书、寻书、藏书、编书、出书，成就了他的一生。

只收“有用之书”的梁启超

梁启超藏书的最大特点是只收藏自己认为的“有用之书”。梁启超讲：“每有所触，应时援笔，无体例，无次序，或发论，或讲学，或记事，或抄书，或用文言，或用俚语，惟意所之。庄生曰：‘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以命吾室。”这就是饮冰室名字的来源。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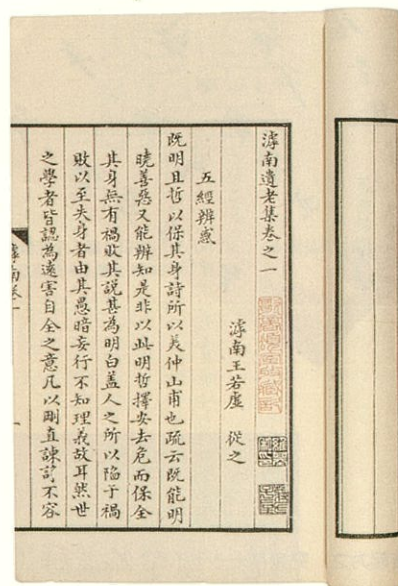
饮冰室位于天津市民族路46号，有书44000余册。经部有宋巾箱本《八经》和白文《五经》《九经》，史部的《史记》《汉书》异本有20多种，还有未刊稿本、私人信札、笔记等。梁启超去世后，1930年，其子女将全部藏书移交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特建“梁启超纪念馆”以作纪念。

戏曲收藏研究的大家吴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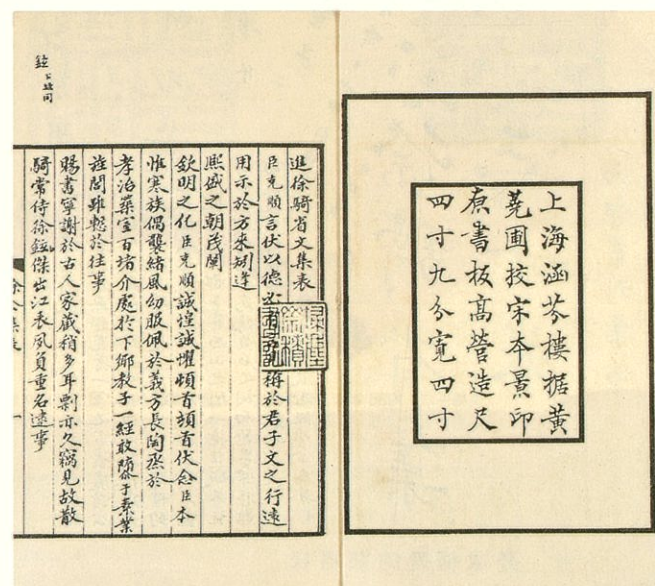
吴梅先生的藏书中，有一类善本数量特别大，那就是戏曲典籍。吴梅自十几岁起就注意搜求戏曲典籍，在北大任教后几乎天天徘徊于琉璃厂、隆福寺一带的书店，能购买的购买，能借抄的借抄，30多年间收藏戏曲600余种，其中不乏善本、孤本，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藏曲大家。藏书室“奢摩他”位于苏州市双林巷35号，“奢摩他”是梵语，意思是精神集中不被外界打扰。

吴梅利用自己的珍藏，精心校勘，编选《奢摩他室曲丛》，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使这部著作广为流传。此后郑振铎倡导刊行《古本戏曲丛刊》，就是受到吴梅的启发。吴梅一生致力于戏曲及声律研究和教学，主要著作有《顾曲麈谈》《曲学通论》《中国戏曲概论》《元剧研究》《南北词谱》，又创作传奇、杂剧12种，培养了大量学有所成的戏曲研究家和教育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吴梅之子将其全部藏书捐献给北京图书馆。

2 出自梁启超于1901年10月起在《清议报》第93册上刊载的杂文集《饮冰室自由书》。



《津南遗老集》◎民国上海涵芬楼《四部丛刊》本



《进徐骑省文集表》



《敦煌遗书残卷》◎水墨纸本 31.7cmx64cm ◎法国国家博物馆 藏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带着一个翻译来到敦煌，在藏经洞连续盗宝七个晚上，共运走了24箱敦煌写本经卷，数量近万卷。此外斯坦因还盗走了5大箱绢画和丝织品，约500幅，所有东西用40多头骆驼才运走。被斯坦因盗走的经卷一部分留在了印度，大部分运回英国，留在大英博物馆。据统计，截至2011年，收藏敦煌遗书前三名的机构分别为：北京图书馆，藏有遗书10000余号；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写本部藏有11297号；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有6000余号。

